

從疫情的報導和討論 看社會價值的轉型

● 林 猛

……盲目的獻身和本能的為善的時代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而自由、公共安寧和社會秩序本身通過啟蒙和教育可以實現的時代即將來臨。

——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剛剛成為全國熱點的1月下旬，一篇題為〈真正的新聞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無人在意〉的舊文章再度在微信流傳，作者陳季冰在其中寫道，傳統媒體的衰敗、自媒體的碎片化以及公眾的漫不經心，使得真正重要的、事關重大公共利益的新聞報導愈來愈難以生產，真正的新聞正在死去。

過去幾年發生的一切佐證了這位作者的判斷，而政府日益嚴格的管控對媒體來說則更是雪上加霜；對我們來說，似乎已經很難想像會有那麼一天，媒體的嚴肅報導和高度關注的公眾之間形成一種正向的反饋，從而重塑人們對新聞業、對負責任的公眾的信心。

然而，就在該文重新流行的這段日子，事情似乎有了驟然的改變。從1月中下旬開始，由武漢發端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近幾個月以來，幾乎獨佔了民眾的注意力——即使是籃球巨星拜仁(Kobe Bryant)的遇難也不曾讓人分心。與此同時，「真正的新聞」復活了，《財新》周刊、《人物》周刊、《三聯生活周刊》等媒體以出色的現場報導，贏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人們在閱讀、轉發之餘，既為報導裏人物的不幸命運而悲傷，也跟隨着記者的調查而努力拼出完整的時間線和責任歸屬。

1960年代的越戰曾被美國人稱作「第一場電視直播的戰爭」(the first television war)，即時的電視報導第一次把戰爭的恐怖帶入了每個家庭，使

千千萬萬美國人對戰爭有了切身的感受。今天對我們而言，同樣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次成為了一場「網絡直播」的災難。災難的具體細節、受害者和救助者的音容笑貌第一次即時地、持續地展現在普通中國人的面前，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力。人們一下子感覺到自己 and 那些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勇敢付出的人之間沒有了距離；很多人加入救助的隊伍，更多的人則投入了就此展開的公共討論中，表達他們的同情和哀痛，批評官僚的遲緩塞責，其中既有學者、作家、詩人、企業家、網絡名人，也有無數普通人。近幾年公共生活的沉悶、虛假，似乎在一瞬間被一掃而空。

對於社會的自我教育和進步而言，一次敞開的公共討論勝過一摞教科書。正是在這次疫情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了媒體報導與公眾討論之間本身可以有一種正向的反饋，看到幾十年社會變遷所積澱的新價值在慢慢擴展，展示出它的說服力量。放在當下中國的輿論和政治環境下，這一點尤其引人注目，讓人看到沉默的外觀下一股無聲的潛流。

正是有感於這一點，筆者不揣冒昧，在討論還未完全落幕之際，急切地想把自己觀察到的和強烈感覺到的那些新趨向、新價值勾勒出來，闡明它們的意義，希望藉此有助於揭示我們從何處來，是何人，到何處去——而這些正是近幾年裏讓我們感到迷惘和焦慮的所在。

一 平民主義視角

久居中國大陸的人士不會注意不到，每當新聞裏報導一些不幸或災

難時，往往會對受害者的某種身份特質予以特別強調，比如強調他是大學生甚至名牌大學生，或者是白領，凡女性就寫成美女，等等。這似乎在暗示某種社會風尚：不幸本身並不足以打動人，只有借助外在條件的反差才能打動人。於是在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案中，我們看到受害人的大學生身份得到了反覆的強調，這在當時對輿論的動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樣做未嘗不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有意無意之間，將社會等級結構留下的烙印帶入了對不幸的關注和同情中。

然而，在這次疫情的媒體報導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平民性。苦難不再被分成等級，普通人的不幸同樣被有尊嚴地記錄着。疫情中並非沒有名流精英去世，但無論是媒體報導還是在讀者的反應裏，都會痛惜由此造成的損失，而哀悼的心情並未因此有別。同樣，電影導演常凱的不幸之所以讓人特別銘記，也與他的導演身份無關，而是他的遺言及其家庭遭受的不幸讓人難以釋懷。

新浪微博網友「瑪麗蓮夢六」於2月9日寫下的一條微博，是這種平民性的最好見證：

那個坐在陽台上敲鑼鳴病的人。

那個深夜追着殯車淒厲地喊着「媽媽」的人。

那個在一千人共用一個衛生間的隔離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個開着貨車在高速路上流離失所沒有歸處的人。

那個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頭等待殯葬車的人。

……

這位作者如詩句般列出的，幾乎都是疫情報導中提到的無名無姓的普通人，可正因為是普通人，對我們的情感產生了更深、更純粹的衝擊，讓我們感到這場災難的無情與嚴酷，感受到人的無助和脆弱，而我們自己就可能是他們中的一員；身世、職業變得無關緊要。可以說，平民主義視角在這裏即意味着一種生命的平等觀，它反對把生命分出高低貴賤的等級，這一點在這次公共討論中得到了廣泛的呼應。

平民性不僅體現在苦難的見證中，也體現在志願行動和救助服務中。這次媒體和網絡的抗疫報導，除了醫護人員是理所當然的主角外，還把大量的篇幅給予了那些平時並不起眼、甚至受到歧視的行業中人，比如出租車司機、外賣騎手、快遞員、殯葬工，等等。於是我們知道了「搞定金銀潭醫院護理難題」的快遞小哥汪勇，在大年初一將十萬隻口罩運往疫區武漢的貨車司機王慎才，為留守武漢的孕婦提供緊急援助的志願者海豚及其團隊，還有不幸去世的志願者何輝……不僅武漢媒體和本地人在採訪和記述中表達了對他們的由衷感激，遠方的讀者也同樣意識到，正是這些普通人的責任心和好心腸，才在艱難時刻維持着瀕於崩潰的城市秩序，減緩了災難對人們的衝擊。

平心而論，這樣一些人士即使出現在正常時期的媒體報導裏，也不會引起我們過多關注。畢竟，通常人們都按階層和圈子生活，一個外賣員、一個服務員遇到的生活上的煩心事、情感上的苦惱乃至悲傷，自然與知識份子圈、商業精英圈的所思所感距離很遠，很難得到共鳴。唯有這次疫情帶來的生死考驗，忽然之間跨越了階

層的隔閡，構成了共同面對的生活背景，從而讓我們願意關注並理解普通人的感受，看到彼此的息息相關。換言之，我們發現了彼此都是人，而且相互依存。

在這一點上，圍繞本次疫情的報導和討論給人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它讓愈來愈多的人萌生了這樣的意識：我們的平安、我們的正常生活，是那麼依賴於這些普通勞動者的忠於職守，依賴於他們的善良、同情以及特殊時刻的自我奉獻。在危機中我們領悟到，這些才是社會運行的基石，而絕非某種政治力量。

略顯悖謬的是，在共和國的早期階段，教科書裏曾經書寫着一種字面含義相近的「平民主義」，但它的基石是否可靠，在多大程度上轉化成了人們的深層信仰，卻十分可疑。至少我們見到的是，隨着舊的精神秩序的解體，鐘擺迅速擺到了另一極；而且它擺得如此極端，最終出現了筆者在前面提到的怪異現象：同是苦難，卻會因為受難者外在身份的差異而在人們心裏產生不同的分量。這真是辯證法所說「物極必反」的絕佳例證，而社會在這種劇烈的擺動中並未找到方向。

社會的健全發展需要探尋一種新的平衡，而不是擺向從前的任意一極。這種平民主義的意識也許只是剛剛萌芽，卻是社會當下病症的一種解藥，代表着社會自我矯正的趨向。

二 新的英雄主義

在這波由疫情引起的公共討論中，還有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就是傳統的英雄主義宣傳模式受到了廣泛

的質疑，人們在一種新的基礎上擁抱英雄主義。這一觀念的改變最能揭示伴隨社會轉型所發生的價值變遷，讓我們看到新的價值已經散播到社會的眾多角落，並在公共討論中顯示出強大的力量。

塑造英雄一直是紅色宣傳的一大特色，通過把權力集團所倡導的價值賦予英雄人物，從而為全社會確立一套行為規範和價值準則，這種做法對於論證體制的合法性、激發大眾的認同有着顯著的好處。從革命戰爭年代的張思德、董存瑞，到後來的雷鋒，各個時期的英雄可以列出很長的一串名單，他們在媒體宣傳中展現出一些共同的特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任勞任怨無私奉獻，而且完全服從組織安排，不討價還價。在這些特質的背後，則是一種與意識形態完全合拍的英雄話語，隨時準備為理想、為神聖的事業而獻出那個微不足道的小我。

這樣的英雄形象在我們的社會文化、尤其是官方文化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迹，至今猶然。所以在新時期的抗洪搶險、地震救災以及撲滅大火等行動中，官媒對英雄人物的宣傳仍然大致沿襲這一套路。然而，它已不能如舊時那樣打動人心，因為安全、家庭等市民生活的價值愈來愈為人們所珍視；人們或許自己做不到勇敢、無私，卻能恪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黃金律，也不期望受惠於別人的徹底無畏、無私。他們更願意在平等互助、尊重權益的基礎上來接受和讚美英雄行為。

這次疫情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這種差異：第一線的參與者不像往常那樣以軍人、消防員或群眾為主體，而是代之以醫生、護士這樣的職業人士群體。對於他們，無論是媒體還是社

會大眾在心理上都有了悄然的變化。人們沒有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傳統標準來要求他們；相反，認為應該傾聽他們的要求，盡可能解決他們遇到的難題，而不是理所當然地以「不怕苦」的名義要求他們做出犧牲。這次為女性醫護人員提供安心禱的「姐妹戰疫安心行動」就是一例，這是一個以前從未進入人們視野的生理細節需求，在政府未及回應時民間人士就主動發起行動，解決了難題，緩解了她們的不便。

同樣，人們對偶爾出現的「流產十天後女護士重回一線」、「女護士懷孕十個月仍堅守在戰疫一線」之類宣傳，也紛紛表示反對，即使在危機之中，人們也不願意無原則地讚美犧牲。一線醫護人員並不因為貼上「英雄」的標籤就應該捨棄一切，他們的安危和權益同樣應該受到充分考慮。甚至像女性醫護人員剃不剃光頭這樣的事情，也要考慮是否必須，是否尊重當事人的意願。所有這些態度都迥異於從前。

隨着抗疫過程中一線醫護人員的高感染率的曝光，殉職者日漸增多，社會要求保護好醫護人員的呼聲愈來愈高，最後政府官員也向這一潮流做了讓步和回應，公開表示要保障醫護人員的休息和健康，不提倡「英雄主義」——這裏顯然指的是那種舊式的英雄宣傳話語。從公共文化的變遷來看，這一表態不能不說具有某種標誌性的意義。

同樣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還有上海華山醫院張文宏醫生風靡一時的金句。他利用抗疫的有利時機，也利用自己的專業地位，極富策略而又旗幟鮮明地為醫護人員發聲。他在採訪中提出，不應該把醫生當作工具，對醫

生的關心應該體現在為他們提供更好的保障上，「醫生應該有免於受傷害的權利」。他甚至提出，「沒有防護，你可以拒絕上崗」。這些話為他贏得了一片喝彩，究其實質，就是社會業已變化的價值觀經他之口做了理直氣壯的宣示。

在抗疫過程中，一位甘肅援鄂護士以筆名弱水吟發表了一組詩歌，其中一首寫道：

口號是你們的
讚美是你們的
宣傳、標兵，都是你們的
我只是在執行崗位職責
做一個醫者良心的拯救
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陣
生和死來不及選擇
真的沒有甚麼高大上的想法
……

在新價值觀下成長起來的人們，雖然頂着英雄之名，卻絲毫不迷戀它的光環，也不習慣於它的豪言壯語；他們能誠實看待自己的境遇，也不推脫生活和職業所加於他們的責任，並願意為此承擔種種後果。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新的、更真實、更切近生活的英雄主義，它正扎根於社會的土壤中，愈來愈顯現它的力量。

這樣的英雄主義會給社會帶來甚麼改變？不妨借用一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話，它將「不要求人們發揮偉大的獻身精神，只促使人們每天作出小小的犧牲。只靠這個原則還不足以養成有德的人，但它可使大批公民循規蹈矩、自我克制、溫和穩健、深謀遠慮和嚴於律己」。在它的支配下，「無疑不會出現太多的驚天動地的德行。但我也認為，到那時

候，怙惡不悛的歹行也將極其稀少」，因而，它是「最符合當代人的需要」的英雄主義。所有這些引語都出自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時代新興的倫理原則——「正確理解的利益原則」——的分析，放在這裏形容新的英雄主義十分妥帖。

三 只有痛苦是真實的

在這次疫情的報導和討論中，還有一個醒目的特點，就是對痛苦的展示。這脫離了常規，甚至有時給人一種管制放鬆的感覺——當然不是真的有意放鬆，而是因為災難到來後，出現了一個管制者無法涵蓋的、對大眾又極其重要的新領域：對痛苦的表達。

蘇聯時代曾有個政治笑話，說美國人和蘇聯人在爭論亞當、夏娃到底是哪國人。美國人說當然是我們美國人，蘇聯人說不對，是蘇聯人，他們沒吃的沒喝的還要告訴人們自己生活在天堂裏，這不是蘇聯人嗎？正如這個笑話所暗示的，在新建成的天堂裏，是沒有痛苦這種人類體驗的，它只有好與更好的矛盾。即使偶有痛苦，很快也會被領袖的恩情和黨的關懷抹平，不會持續存在；持續存在的痛苦是對它所允諾並實現的美好生活的全面否定。

所以，在新社會被展示的，永遠只有各種真實的、誇張的和虛假的幸福；痛苦——如果有的話，只屬於敵人，我們不需要去體驗深刻的痛苦。即使是死亡，值得進入公共言說的也只有兩種：或是偉大光榮的死，重於泰山；或是渺小可恥的死，輕於鴻毛。這兩種死都有教育意義，有助於

培養共和國需要的民眾。至於生老病死所激起的哀痛，則不應過多渲染，尤其不值得進入公共論壇，因為它會挫傷人們的情緒，帶來消極影響。

在疫情期間，恰好有一位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士專門發文，談到這個問題。他對很多作家、知識份子在疫情中的寫作和表現不滿，稱他們「不是用自己手中之筆支持國家的抗災大事，而是在哪兒拼命傳播恐怖、擴張恐懼、製造謠言，甚至大寫死亡，寫火葬場，寫遇難者的心碎的哭喊。……只要看了這個場面，武漢，這個抗疫大戰的英雄城市的形象就立刻會蕩然無存。你就會感到恐懼，感到害怕，感到絕望」。這樣的論調在這個時代很難獲得同情的回應，但它其實代表了一種曾經主導公共生活的聲音。它試圖重建過去的霸權，卻沒有想到，它的失敗正緣於此：因為這無異於把人類生存體驗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摒棄在外。當社會面臨如此巨大的災難，人們真實地感受到悲痛、恐懼、無助而需要表達時，它甚麼都不能提供，人們自然會去尋找替他們表達的聲音。

這就像新社會長期摒棄那種所謂「格調不高」的市民文化，結果造成了它在這方面的完全空白。所以在體制還未轉軌時，鄧麗君就已經悄然流行，等到日本電影《追捕》、金庸小說洶湧而來，它就潰不成軍了——它的意識形態摒棄現實的痛苦，這導致了同樣的問題。

這次疫情還有一些特點，使得痛苦的表達顯得尤為迫切。首先是它的長時間延續性，像汶川地震、天津港爆炸都在一瞬間完成了傷害，作為新聞少了持續的衝擊力；其次是武漢的中心城市地位，使得封鎖消息變得困

難；最後是疫情的擴散性讓人人都感受到威脅，不能置身事外。所有這些特點使得痛苦的情感奔湧而出，而針對痛苦的維穩無法在當下展開。

當聽到女孩哭喊「媽媽」的聲音，看到妻子悲慟地送別丈夫殯車的鏡頭，這種真實的痛苦錘擊着我們，使旁觀者不再是旁觀者。在痛苦中，我們感受到了真實的自己的存在，也感受到一個未被污染的公共空間的存在。

這正是痛苦的力量所在，也是它作為紐帶的意義所在。可以說，我們通過共同感受痛苦，共同哀悼李文亮醫生而連接成為一個道德共同體，克服了平時的漫無目的、分崩離析。未來當我們遇到陌生人，談論起2月6日晚上感到的悲痛，我們就可以知道，彼此是同類。

四 結語

筆者這裏只是記錄下在這場疫情的討論中，自己所觀察到、所強烈感覺到的東西。至於它們在多大範圍內存在，這些新因素多大程度會繼續生長，未來的人們在回顧今天的時候是否會將社會的拐點歸結到此刻，只有留給時間去做結論了。

至於未來，筆者唯一可以確信的是將會有兩類人：記得今天這一幕的人，以及把這一幕或遺忘或塗上各種油彩的人。

謹以此文獻給李文亮大夫。

林 猛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講師